

明清方志的海防记述之形成与演变

——以广东澄海县为例^{*}

姚舒婷 黄忠鑫

提 要：明清方志《海防志》的形成与演变是体现地方官绅海防思想的重要文献资料。作为海防要地，广东澄海县的清代各版县志《海防志》之记述内容有显著变化。康熙、雍正两版县志名为“海氛志”，具有纪传体色彩，主要记录明代和清初的海盗代表人物；乾隆、嘉庆两版县志改以“海防志”作为篇名，相关记述转为编年体，并以按语等形式记录诸多重要海防信息。篇名与体例的变化，表明方志记载的重心从海盗事件逐渐转向海防建设与海防地理，反映出不同时期澄海地方官员与士绅的海防观念的变化，有助于审视明清海防思想演进的多种面相。

关键词：清代 澄海 《海防志》 海防记述

明清时期沿海各省方志中涌现出不少海防记述，有附于兵防志、舆地志下的“海防”篇，还有专门的《海防志》，皆为宋元方志所不及，可谓“古有兵防而无海防，海之有防自明季始”^①的绝佳解释。随着“海之有防”局势的出现，海防思想也逐渐产生和发展。以往对明清海防思想的研究大多聚焦于君主、大臣或有影响力的文人学者^②，但对方志所反映的基层官员和地方士绅之海防观念则关注不足。目前所见，何沛东关注清代浙江方志《海防图》的绘制，进而探讨清代地方士绅对海防地理、制度的认知情况。^③张少青对清代《广东通志·海防志》做了专题研究，呈现出清代方志《海防志》的基本面貌，但未能以长时段的视角关注明清方志海防记述的演变脉络。^④姜漫分析明清海南方志《海黎志》的体例、编纂思想及史料来源，但其对《海黎志》的解读主要在海盗活动和治海举措方面，较少着眼方志中的地理要素。^⑤石宏云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课题“明清广东海防地理史料的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20VJXT004）阶段性成果。

① 金烈、张嗣衍修纂：乾隆《广州府志》卷7《海防》，“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广州府部，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影印本，第4册，第178页。

② 代表性研究成果有易泽阳：《明朝中期的海防思想研究》，解放军出版社，2008年；童杰：《郑若曾〈筹海图编〉的史学价值》，《史学史研究》2012年第2期；周孝雷：《俞大猷的海防地理思想与海防实践研究》，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万明：《明代海疆治理与危机应对——以两部〈闽海纪事〉为线索》，《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戚其章：《晚清海防思想的发展及其历史地位》，《东岳论丛》1998年第5期；陈文源：《〈广东海防汇览〉研究》，李金强、刘文章、麦劲生编：《近代中国海防——军事与经济》，香港中国近代史学会，1999年；王宏斌：《清代前期海防：思想与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王宏斌：《晚清海防：思想与制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李恭忠、李霞：《倭寇记忆与中国海权观念的演进——从〈筹海图编〉到〈洋防辑要〉的考察》，《江海学刊》2007年第3期；成一农、杜晓伟：《陈伦炯绘〈沿海全图〉及其海防认知分析》，《社会科学战线》2021年第6期。

③ 参见何沛东：《清代方志舆图的海防描绘——以〈嘉兴府志·海防图〉为例》，李庆新主编：《海洋史研究》第12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

④ 参见张少青：《明清地方士人的海洋观研究——基于广东方志之考察》，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⑤ 参见姜漫：《明清海南方志〈海黎志〉研究》，海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

利用明清广东方志中的沿海地图分析广东海防及海防思想，但侧重于静态的制度描述，较少关注舆图的空间信息。^①既有研究往往以方志的海防记述为基础讨论地方的海防建置演变、军事防御能力等问题，对海防地理的分析较为欠缺。

广东澄海县位于潮汕平原的中心地带，海防地位重要。康熙《澄海县志》载：“澄地滨海，鲸鲵穴宅，吹潮鼓浪，起灭不常，弹丸一区，独当三面，为全潮要害。”^②嘉靖四十二年（1563），澄海设县，正是加强地区海防之表现。^③明清鼎革之际，澄海县更是明郑集团与清军进行拉锯战的主战场。澄海立县后，县志修撰较为连贯。万历年间，王嘉忠、王天性即修成第一部《澄海县志》，惜今已佚。清前期，澄海共修纂志书4次，分别为王岱等修纂康熙二十五年（1686）刊《澄海县志》共22卷（以下简称“康熙志”），宁时文等修纂雍正九年（1731）刊《澄海县志》共24卷（以下简称“雍正志”），金廷烈等修纂乾隆二十九年（1764）传抄本《澄海县志》共29卷，首1卷（以下简称“乾隆志”），李书吉等修纂嘉庆十九年（1814）刊《澄海县志》共26卷，首1卷（以下简称“嘉庆志”）。4部清代《澄海县志》都专门设置记载“海防”信息的篇目。康熙、雍正两版县志编修的《海氛志》主要以海盗和事件为记述对象，具有纪传体的特征。乾隆、嘉庆县志在《海氛志》基础上形成《海防志》，以海防建置和海防地理为主要内容，体例变为编年体。清代《澄海县志》的《海防志》形成脉络清晰，是观察方志海防记述的较好样本。因此，本文对《澄海县志》的海防记述展开研究，关注其体例、内容、记述方式的变化，进而探讨明清地方海防地理思想的演变。

一 《海氛志》：以海盗和事件为记述对象

康熙二十二年（1683），朝廷“命大臣巡海隅黔黎疾苦，复令天下郡县画图，山川城郭以进”^④。随着台湾的收复，东南沿海逐渐恢复秩序，修纂方志有助于国家力量的地方治理，于是中断已久的修志传统亦逐渐恢复。在此影响下，清代澄海首部县志于康熙二十五年付梓。^⑤

据康熙志《修志姓氏》记载，参与志书纂修的有7人^⑥，其中对志书修纂贡献较大者当为知县王岱。^⑦王岱，字山长，湖南湘潭人，明崇祯己卯（1639）举人，澄海任上颇有作为，修城兴学，深受地方人士爱戴，“祀生祠，配享韩、陆二公，入广东名宦”^⑧。他认为：“自万历乙未以后，一切未纪，滨海残疆，文献无征，采之传闻游谈失实”，故其修志时“旁搜广引，订以志

^① 参见石宏云：《明清广东方志中的沿海地图研究》，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

^② 王岱纂修：康熙《澄海县志》卷4《城池》，“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潮州府部，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影印本，第30册，第53页。

^③ 参见陈春声：《地方故事与国家历史——韩江中下游地域的社会变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第192页。

^④ 王岱：《重修澄海县志序》，康熙《澄海县志》卷首，“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潮州府部，第30册，第15页。

^⑤ 参见王岱：《重修澄海县志序》，康熙《澄海县志》卷首，“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潮州府部，第30册，第17页。

^⑥ 参见王岱纂修：康熙《澄海县志》卷首《修志姓氏》，“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潮州府部，第30册，第21页。

^⑦ 参见裴宪度：《澄海县志序》，王岱纂修：康熙《澄海县志》卷首，“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潮州府部，第30册，第2页；杨钟岳：《澄海县志序》，王岱纂修：康熙《澄海县志》卷首，“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潮州府部，第30册，第8页；陈守溪：《澄海县志跋》，王岱纂修：康熙《澄海县志》卷末，“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潮州府部，第30册，第238页。

^⑧ 张云璈纂修：嘉庆《湘潭县志》卷28《人物传》，“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台北成文出版社，2014年，第1115号，第1411—1412页。

书，仍本省、郡两志，加之损益”^①。康熙志《凡例》亦云：“兹取旧志，删其肤冗，正其错讹，补其阙略，于通志、郡志之外，旁收广稽，博访传闻。”^②由此看来，该志纂成是基于旧志和“博访”两个部分，《海氛志》的内容亦如此。

康熙志《海氛志》直接史源是顺治、康熙两部府志《兵事》记述。顺治《潮州府志》始设《兵事部》，记事 112 篇，详述“盗贼变乱始末”，以明“防御之不可以不严矣”^③。康熙府志《兵事志》继承此种方式，并略作删减增补，仅删去顺治府志中秦汉以前的 3 篇记述^④，增加明清之际发生在潮州地区的 12 起动乱事件。^⑤康熙志《海氛志》只保留府志《兵事志》中涉及澄海的海寇和海患事件，省去府志《兵事志》所载元代以前的 13 篇山海动乱的内容，涉及山寇动乱的记述以及发生在澄海县以外的海患事件。

进一步溯源，可以发现顺治、康熙两部府志《兵事》记述参照了陈天资《东里志·境事志》以及郭子章《潮中杂记·国朝平寇考》的内容。^⑥潮州知府吴颖在给顺治《潮州府志》作序时就提及《潮中杂记》一书可供择采，补所不备。^⑦又云：陈天资所作《东里志》“词旨苍凉，颇多感动，惜乎未得其全帙而读之”^⑧。所以，上述二书应是康熙志《海氛志》的间接史源。

由于府志《兵事志》要明晰“盗贼变乱始末”，因此采用纪事本末体体例，主要突出事件的原始本末和因果关系。但康熙志《海氛志》意在呈现海疆动乱的情形^⑨，故使用纪传体改编府志《兵事志》，尤为强调人物对寇乱事件的重要性。“海氛”顾名思义就是指代海疆动乱的形势。《海氛志》在序言中指出：“溟渤巨区，鲸鲵薮泽。威德时穷，旋生衅孽，与为羁縻，毋宁屏绝，志海氛。”^⑩该篇实际上反映出澄海地方官员治理海疆的策略是杜绝海寇。

《海氛志》收录 18 名海盗的传记，元明清历朝分别为 1、12、5 名。其基本表述方式是以人物为纲，以时间、事件为线索，描述宋元之际到清朝初年澄海海疆情况的演变大势。《海氛志》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三部分。一是海寇和海患事件；二是滨海地区的地理情况；三是修志者对相关人物、事件加以考证或评述的“考语”“按语”及“论曰”等内容。

编撰者认为海寇是海疆动乱的根源，因而海寇和海患事件是《海氛志》的叙述主体部分，

^① 王岱：《重修澄海县志序》，康熙《澄海县志》卷首，“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潮州府部，第 30 册，第 15 页。

^② 王岱纂修：康熙《澄海县志》卷首《凡例》，“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潮州府部，第 30 册，第 22 页。

^③ 吴颖纂修：顺治《潮州府志》卷 1《地书部·兵防考》，“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潮州府部，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 年影印本，第 1 册，第 171 页。

^④ 参见吴颖纂修：顺治《潮州府志》卷 7《兵事部》，“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潮州府部，第 1 册，第 376 页。

^⑤ 参见林杭学纂修：康熙《潮州府志》卷 5《兵事志》，“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潮州府部，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 年影印本，第 1 册，第 179—183 页。

^⑥ 参见吴颖：《潮州府志序》，顺治《潮州府志》卷首《旧序·发凡》，“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潮州府部，第 1 册，第 137 页。又，陈天资《东里志》卷 1《境事志》、郭子章《潮中杂记》之《国朝平寇考》均有记述海寇及海患事件。参见陈天资编修，饶平县地方志办公室校订：《东里志》卷 1《境事志》，内部资料，2001 年，第 50—59 页；郭子章：《潮中杂记》卷 10《国朝平寇记上》、卷 11《国朝平寇记下》，饶宗颐主编：《潮州善本选集》（第一种），香港潮州商会，1993 年，第 284—354 页。

^⑦ 参见吴颖：《潮州府志序》，顺治《潮州府志》卷首《旧序·发凡》，“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潮州府部，第 1 册，第 137 页。

^⑧ 吴颖：《潮州府志序》，顺治《潮州府志》卷首《旧序·发凡》，“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潮州府部，第 1 册，第 138 页。

^⑨ 参见王岱纂修：康熙《澄海县志》卷 19《海氛》，“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潮州府部，第 30 册，第 168 页。

^⑩ 王岱纂修：康熙《澄海县志》卷 19《海氛》，“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潮州府部，第 30 册，第 168 页。

详细记载海寇的籍贯、从盗经历及最终下落。府志在描述海寇时，因体例限制，故较少论述海寇的籍贯。《海氛志》通过增补和改写两个方式补充海寇的籍贯，其中以澄海籍居多。18位海寇中，澄海籍海寇有魏崇辉、许朝光等11人，非澄海籍海寇有7人。只是，不同的文献对海寇籍贯莫衷一是。如林道乾，《海氛志》认为其是澄海𬶍浦都月浦人。^①但稍后的乾隆《潮州府志》却记作惠来人。^②又如，曾一本，康熙《潮州府志》作福建诏安人^③，县志则将其改为海阳薛陇人。^④此外，海寇林凤，明人陈天资之《东里志》称其为福建诏安人^⑤，但《海氛志》则将其改为海阳人。^⑥海寇的籍贯认定是一件颇为麻烦之事，“地方官员为了推卸责任，更加愿意把这些‘大盗’说成外地人氏，结果，不同地方的文献就会有不同的记载”^⑦。在此情况下，《海氛志》却将诸多海寇详载归入当地村落，承认真实籍贯归属，具有吸取经验并有针对性地强化对本地滨海地区控制的意味。

《海氛志》虽然以人物传记为主，但存有对滨海地理情况的描述。该篇在记述夏岭之乱时，就注意到“夏岭近海，人剽悍，素不受有司约束”^⑧之风俗；也描绘了滨海地区人群“或起渔猎，或自商贾”^⑨的生计传统。对于海寇在占领区内的贸易情形，《海氛志》亦有记载，如倭寇猖獗时，许朝光占据牛田洋“盘问船只，不问大小，俱勒纳银，然后给票照，方敢往来生理，名曰报水”^⑩；再如，丘辉在达濠埠“置市廛数百间，擅一府鱼盐之利，潮商买盐上广济桥贩卖，非有贼票不敢出港也”^⑪。这些描述都展现了沿海地区的经济地理情况。

《海氛志》的“考语”“按语”及“论曰”完全为康熙志新增。“考语”多为考证某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如林道乾围攻溪东寨时，府志未提及邑人陈求默的抵抗事迹，而《海氛志》则依据《人物志》补充其传记。^⑫“按语”是修志者对相关论述所作的说明或提示，如《海氛志》补充邑人蔡茂植“破产赡兵，修筑城垣”^⑬以捍御海寇的经历。“论曰”则集中表达了纂修者对海氛不靖的评论，如下文：

是以海氛兴灭，其来已旧，揆厥所由，地远王化，职司土者，教养无素，抚绥失宜，困以刑诛，迫以奔窜，即欲不为海盗，其可得乎。及劳师剪伐，根株难净，萌孽复生。初以赤子弄兵潢池，继以羁縻成名，孺子良可拊膺。今天威远播，海孽潜消，往事之鉴，犹未可略也。^⑭

- ① 参见王岱纂修：康熙《澄海县志》卷19《海氛》，“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潮州府部，第30册，第170页。
- ② 参见周硕勋纂修：乾隆《潮州府志》卷38《征抚》，“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潮州府部，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影印本，第934页。
- ③ 参见林杭学纂修：康熙《潮州府志》卷5《兵事志》，“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潮州府部，第1册，第166页。
- ④ 参见林杭学纂修：康熙《澄海县志》卷19《海氛》，“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潮州府部，第30册，第170页。
- ⑤ 参见陈天资编修，饶平县地方志办公室校订：《东里志》卷1《境事志》，第58—59页。
- ⑥ 参见王岱纂修：康熙《澄海县志》卷19《海氛》，“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潮州府部，第30册，第171页。
- ⑦ 陈春声：《地方故事与国家历史：韩江中下游地域的社会变迁》，第122页。
- ⑧ 王岱纂修：康熙《澄海县志》卷19《海氛》，“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潮州府部，第30册，第168页。
- ⑨ 王岱纂修：康熙《澄海县志》卷19《海氛》，“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潮州府部，第30册，第175页。
- ⑩ 王岱纂修：康熙《澄海县志》卷19《海氛》，“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潮州府部，第30册，第169—170页。
- ⑪ 王岱纂修：康熙《澄海县志》卷19《海氛》，“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潮州府部，第30册，第175页。
- ⑫ 参见王岱纂修：康熙《澄海县志》卷13《人物志》，“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潮州府部，第30册，第140页。
- ⑬ 王岱纂修：康熙《澄海县志》卷19《海氛》，“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潮州府部，第30册，第175页。
- ⑭ 王岱纂修：康熙《澄海县志》卷19《海氛》，“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潮州府部，第30册，第175页。

修志者认为海寇消失的原因不在于武力镇压，而依赖于地方官员的教化得当。潮州知府林杭学就曾指出王岱修纂该志的初衷正是“直欲使德化胜于桁杨，礼乐兴于旦夕”^①。“康熙志《兵防志》云：然前此海氛莫御，岂尽险无可恃乎……东海鱼盐，与穷阎共利，使家给人足，不复饥寒流困，尚何藉于防御之严乎”同样阐述教化海寇的思想^②。可见，方志编纂者注重人的因素，并将对海贼的教化作为海防的基本途径和重要经验。

需要指出的是，嘉靖年间，潮州地方士绅似乎并不认同教化海寇做法。海阳县塘湖市（今潮安区龙湖镇市头村）地处韩江沿岸，该地因积蓄稍饶，屡被寇扰。嘉靖三十七年（1558）勒石的《塘湖刘公御倭保障碑记》记录了乡居士大夫主持防御盗贼和城寨建设的事迹。嘉靖三十七年，倭寇“戕老稚，掳丁壮，焚室庐，祸乱之惨，近古所无”^③。面对来势汹汹的寇盗乱匪、地棍兵痞，回乡守制的福建少参刘见湖“目击时事，若恫瘝乃身”，故带领乡人“建堡立甲，置栅设栏，鼓以义勇，申严约束，相率捍御”^④。可见，当海患事件真正发生时，组织抵御才是最实在的海防经验。

雍正志卷20《海氛志》基本沿袭康熙志《海氛志》的内容，只是在几处地方略有不同。一是康熙志认为海寇“臭红肉”为丘辉。^⑤雍正志中则作北辉。^⑥成书更早的康熙府志，将海寇“臭红肉”作“丘辉”^⑦。此外，清人江日升所著《台湾外记》对海寇“臭红肉”的记载是：“粤东之潮阳人丘辉，绰号臭红肉，年少猛能，纠众出踞达濠。”^⑧据此也可以判定，海寇臭红肉应作“丘辉”。至于雍正志把丘辉改做北辉，应与雍正三年（1725），皇帝下令避孔子名讳有关。稍后的乾隆志、嘉庆志在此影响下，则将“丘辉”改作“邱辉”。二是雍正志中魏五传的内容相比于康熙志，缺少“往来贸易四五年，则被贼党丘辉设计杀之，尽并其众，自是臭红肉益肆焚劫矣”一句。三是雍正志《海氛志》未收录康熙志《海氛志》“论曰”的内容。后两条缺失内容均在同一页内，推测是版本在流传过程中出现缺页。要之，雍正志《海氛志》基本保留了康熙志《海氛志》的内容，表明其认可和继承后者的核心思想。

康熙志、雍正志的海防记述以人物和事件为中心，阐述了海寇与海氛的关系，其主要的海防认知是防倭、防寇。由于《海氛志》的海防记述侧重人物和事件，因此其体现的海防地理思想还很朦胧。随后经过乾隆志和嘉庆志的发展，清代澄海县志的海防记述确立了《海防志》的形式，进一步反映出澄海地方官绅的海防思想，尤其是海防地理思想的发展与演变。

二 《海防志》的出现：以海防建置和海防地理为记述对象

从乾隆志开始，明确以“海防”为名的志目开始出现。乾隆志之纂修是集体所为，该志的主修者系澄海县知县金廷烈，负责具体修志事宜的21人中，澄海本地之吏员、士绅、生员占

^① 林杭学：《澄海县志序》，王岱纂修：康熙《澄海县志》卷首，“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潮州府部，第30册，第5页。

^② 王岱纂修：康熙《澄海县志》卷11《兵防志》，“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潮州府部，第30册，第106页。

^③ 陈厉明主编：《潮汕文物志》（上册），汕头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编印，1985年，第335页。

^④ 陈厉明主编：《潮汕文物志》（上册），第335页。

^⑤ 参见王岱纂修：康熙《澄海县志》卷19《海氛》，“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潮州府部，第30册，第174页。

^⑥ 参见宁时文纂修：雍正《澄海县志》卷20《海氛》，“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潮州府部，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影印本，第27册，第218页。

^⑦ 林杭学纂修：康熙《潮州府志》卷5《兵事志》，“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潮州府部，第1册，第180—181页。

^⑧ 江日升撰，刘文泰等点校：《台湾外记》，齐鲁书社，2004年，第201页。

15人①，因此，十分熟悉当地之沿革掌故与山川形势。

乾隆志在《凡例》中称：“志书通例概用纪传，兹因头绪繁多，于各条例内更提纲目以便分卷，惟海防一篇则全仿编年，虽系变体，似觉得详尽，识者谅之。”② 乾隆志《海防志》将康熙志《海氛志》的纪传体改为编年体，这是因为对于清代前期地方官员而言，强大的海贼集团是刚刚经历的现实威胁，故康熙志《海氛志》以人物为中心进行撰述，选用纪传体的体例；但对乾隆朝官员而言，强大的组织化海上集团已成历史，故将其按照年份条列，“爰取旧志海氛篇重编甲子。冗者删之，阙者补之，讹者正之”③。因此，乾隆志《海防志》在书写范式、史实订正等方面都与康熙志、雍正志《海氛志》出入颇多。

乾隆志《海防志》“起自明英宗天顺癸未，终于国朝康熙甲寅”④，主要由三部分内容构成：第一，将人物经历改编为事件编年，侧重官府的应对举措。第二，增加林大春、王天性等若干时人的海防议论和见解。第三，补充海防建置和海防地理方面的内容。其中第二、第三部分的内容有2000余字，约占据《海防志》篇幅的一半以上，突出记述重心在于海防建置和海防地理。

（一）事件编年

将《海氛志》以人物为线索，转变为官府平定寇乱的时间为叙述顺序。以曾一本为例，康熙志《海氛志》首先追溯曾一本在潮阳、揭阳等地的劫掠行为；其次论及其绑架澄海知县张睿、掳杀参将缪印的罪行；又将其反复叛乱，戏弄地方官员的事迹详载在册。⑤ 不难看出，康熙志《海氛志》强调曾一本劫掠地方，绑架官员，反复叛乱的面相。

而乾隆志《海防志》将这些内容悉数删除，更为侧重官方抵御海寇的书写。乾隆志《海防志》在记述曾一本时，开篇即强调明朝官军大破海寇曾一本于莱芜的行动。⑥ 当时曾一本“攻掠闽、广，官军会剿数年，不能平事”⑦。时任兵部左侍郎刘焘会同广东巡抚熊桴、福建巡抚涂泽民以及总兵俞大猷、李锡，参将王诏等出兵剿贼。该志详细描述官军在柘林、马耳澳、铜山洋等地截击海盗，“五战皆捷”的战斗过程。⑧ 又记载总兵郭成在大莱芜击中曾一本坐舰，迫使其投水寻死的战绩。⑨ 这种叙事风格同样见于其他海寇的描述中。

（二）时人的海防观

乾隆志《海防志》之纂修目的是“详其方略得失，以为后世之鉴，庶几观者可以了如指掌

① 参见金廷烈纂修：乾隆《澄海县志》卷首《修志姓氏》，“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潮州府部，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影印本，第28册，第23页。

② 金廷烈纂修：乾隆《澄海县志》卷首《凡例》，“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潮州府部，第28册，第97—98页。

③ 金廷烈纂修：乾隆《澄海县志》卷20“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潮州府部，第29册，《经略·海防》，第947页。

④ 金廷烈纂修：乾隆《澄海县志》卷20“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潮州府部，第29册，《经略·海防》，第947页。

⑤ 参见王岱纂修：康熙《澄海县志》卷19《海氛》，“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潮州府部，第30册，第170页。

⑥ 参见金廷烈纂修：乾隆《澄海县志》卷20“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潮州府部，第29册，《经略·海防》，第959页。

⑦ 金廷烈纂修：乾隆《澄海县志》卷20“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潮州府部，第29册，《经略·海防》，第959—960页。

⑧ 参见金廷烈纂修：乾隆《澄海县志》卷20“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潮州府部，第29册，《经略·海防》，第960页。

⑨ 参见金廷烈纂修：乾隆《澄海县志》卷20“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潮州府部，第29册，《经略·海防》，第960页。

云”^①。因此该志行文过程中，不时援引前人或时人的观点，以详明海防方略。如，援引嘉万年间潮州著名士大夫林大春的论述，总结海患频发的原因及应对策略。

修志者借引文阐述了海患不靖的两大原因。一方面是山寇、海寇、倭寇相因为祸；另一方面则是官府与海寇互通声气。^② 其应对策略亦有二，一是希望官员守土尽责，御盗护民；二是组织民间力量抵御海寇。^③ 这一部分内容可能源自乾隆《潮州府志》之《征抚》篇^④以及林大春《井丹先生集》的《论海寇必诛状》^⑤。但县志在援引时省略了林大春对于澄海境外海患事件的论述，以便符合方志“划地而书”的习惯。

又如，乾隆志《海防志》援引明万历年间邑人王天性的论述，分析官军不敌海寇的原因是官府“酿成之过”^⑥。朱良宝、林道乾等徒曾在澄海盘踞，但由于官府缺乏杜绝海寇的决心和措施才导致海寇卷土重来。王氏所云，出自所著之《平寇论跋》。^⑦ 《海防志》将时人的海防议论融入事件叙述，总结“官民堵御之方”^⑧ 的意图亦得到彰显。

（三）海防建置和海防地理

乾隆志《海防志》主要以按语等形式补充历代澄海地方的海防建置情况和海防地理局势。嘉靖三十七年，许朝光“入踞辟望村，分屯𬶍浦”^⑨。为了显示𬶍浦之重要性，乾隆志《海防志》将宋代𬶍浦水寨的情况以按语形式标注。^⑩ 万历初年，朱良宝筑寨南洋。^⑪ 由于苏湾都水寨扼守南洋等地，乾隆志《海防志》详细记载明代苏湾水寨之情形。^⑫ 此前，顺治、康熙《潮州府志》与康熙志、雍正志亦有记述水寨，只是前两部志书置于《城池》篇内，而后两部县志则系在《古迹志》中。^⑬ 乾隆志将旧县志《古迹志》所载的水寨记述移入《海防志》，则表明地方士绅在总结海防经验时开始重视历史时期海防设施的作用。

^① 金廷烈纂修：乾隆《澄海县志》卷20《经略·海防》，“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潮州府部，第29册，第947页。

^② 参见金廷烈纂修：乾隆《澄海县志》卷20《经略·海防》，“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潮州府部，第29册，第951页。

^③ 参见金廷烈纂修：乾隆《澄海县志》卷20《经略·海防》，“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潮州府部，第29册，第953—955页。

^④ 参见周硕勋纂修：乾隆《潮州府志》卷38《征抚》，“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潮州府部，第4册，第928—929页。

^⑤ 参见冯奉初辑，吴二持点校：《潮州耆旧集》卷20《林提学井丹集（一）》，暨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22—324页。

^⑥ 金廷烈纂修：乾隆《澄海县志》卷20《经略·海防》，“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潮州府部，第29册，第963页。

^⑦ 参见周硕勋纂修：乾隆《潮州府志》卷41《艺文志》，“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潮州府部，第4册，第1068页。

^⑧ 金廷烈纂修：乾隆《澄海县志》卷20《经略·海防》，“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潮州府部，第29册，第947页。

^⑨ 金廷烈纂修：乾隆《澄海县志》卷20《经略·海防》，“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潮州府部，第29册，第949页。

^⑩ 参见金廷烈纂修：乾隆《澄海县志》卷20《经略·海防》，“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潮州府部，第29册，第950页。

^⑪ 参见金廷烈纂修：乾隆《澄海县志》卷20《经略·海防》，“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潮州府部，第29册，第962页。

^⑫ 参见金廷烈纂修：乾隆《澄海县志》卷20《经略·海防》，“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潮州府部，第29册，第965页。

^⑬ 参见吴颖纂修：顺治《潮州府志》卷1《地书部·城池》，“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潮州府部，第1册，第153页；林杭学纂修：康熙《潮州府志》卷2《城池》，“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潮州府部，第1册，第78页；王岱纂修：康熙《澄海县志》卷17《流寓·古迹附》，“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潮州府部，第30册，第157页；宁时文纂修：雍正《澄海县志》卷10《古迹》，“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潮州府部，第27册，第382页。

修志者还追溯明代在南澳岛的海防官员建置情况，认为万历年间南澳的寨游、总兵之设在海患预警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①这一论述援引自乾隆《潮州府志·兵防志》的“南澳游兵”条和“本游汛地”条。^②乾隆志《海防志》在借鉴乾隆《潮州府志》这两条内容时省略了南澳游兵的巡哨区域和会哨地点，只强调明代汛游不举和兵防不兴对澄海海防的影响。这一方面是因为乾隆志主张：“志以从地，界画须清……政令所不及，殊为附会，类此者多，概从删节。”^③另一方面则反映出乾隆志《海防志》较为强调历史时期海防设施的记述倾向。此外乾隆志将当时施行的巡洋会哨、战船武备等制度悉数置于《营汛志》内记载。^④这表明，乾隆志《海防志》仍以历史经验为海防记述的主要依据。

至于海防地理，乾隆志《海防志》认为“澄故海国，风涛险恶，天水森茫”^⑤，所以“海防之当讲也，视陆地尤甚”^⑥。由于澄海的海防重于陆防，所以乾隆志只有《海防志》而无《兵防志》。^⑦基于海防实践的认识，乾隆志《海防志》尤为注重记录海寇登陆的海岸地点、行进路线以及沿途的军事设施。嘉靖三十七年“倭自漳泉，由梧屿，趋揭阳，掠蓬州、大井、𬶍江、𬶍浦、下外、苏湾等处”^⑧，随后引用明代思想家朱健之语指出这些地点的海防地理价值，“潮为岭东巨镇，蓬洲、大城诸所，跬步海涛，近保三阳，远卫东岭，扼吭拊背之防，均不可一日缓”^⑨。又，嘉靖三十八年倭寇“犯黄冈镇，流寇樟林，屯南洋”^⑩。乾隆志《海防志》则指出：“樟林地当水陆之冲，接连鸿沟，盐灶沿海一带，奸匪多从此出没，最关紧要。”^⑪可见，乾隆志《海防志》以海防的视角重新审视山川的军事地理价值，进而呈现出浓厚的地理色彩。

海口、海港、海道是海防战略布局的基础。澄海“以大海为要，海寇荡舟，乘潮可入”^⑫。康熙志和雍正志在《山川》篇曾提及“西港、溪东港、南港、新港、东港俱内地咽喉，海寇由之出没”^⑬。乾隆志《海防志》则直接阐明境内十数个港口的战略防守意义。

澄邑，沿海之地，港凡十有二，皆前代盗贼出没之所，其来飘驰，其去影息，数为内地患。当其连舶南下，自东陇、旗岭、飞钱、蓬子诸港入，而苏湾危；自南、北二港入，而下外危；自新港、东港、西港、大港、溪东港入，而蓬州、𬶍浦、𬶍江危。虽上

^① 参见金廷烈纂修：乾隆《澄海县志》卷20《经略·海防》，“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潮州府部，第29册，第966—967页。

^② 参见周硕勋纂修：乾隆《潮州府志》卷36《兵防志》，“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潮州府部，第4册，第854页。

^③ 金廷烈纂修：乾隆《澄海县志》卷首《通例》，“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潮州府部，第28册，第96页。

^④ 参见金廷烈纂修：乾隆《澄海县志》卷10《营建五·营汛》，“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潮州府部，第28册，第467—485页。

^⑤ 金廷烈纂修：乾隆《澄海县志》卷20《经略·海防》，“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潮州府部，第4册，第947页。

^⑥ 金廷烈纂修：乾隆《澄海县志》卷20《经略·海防》，“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潮州府部，第4册，第947页。

^⑦ 参见金廷烈纂修：乾隆《澄海县志》卷首《目录》，“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潮州府部，第28册，第27—33页。

^⑧ 金廷烈纂修：乾隆《澄海县志》卷20《经略·海防》，“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潮州府部，第29册，第949页。

^⑨ 金廷烈纂修：乾隆《澄海县志》卷20《经略·海防》，“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潮州府部，第29册，第949页。

^⑩ 金廷烈纂修：乾隆《澄海县志》卷20《经略·海防》，“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潮州府部，第29册，第951页。

^⑪ 金廷烈纂修：乾隆《澄海县志》卷20《经略·海防》，“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潮州府部，第29册，第951页。

^⑫ 蓝鼎元：《鹿洲初集》卷12《澄海县图说》，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第41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7年，第403册，第890页。

^⑬ 王岱纂修：康熙《澄海县志》卷1《山川》，“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潮州府部，第30册，第40页；宁时文纂修：雍正《澄海县志》卷1《山川》，“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潮州府部，第27册，第47页。

外、中外二都稍邻内地，然前途震惊，阖邑俱动，譬人一身，业已熏耳断手，则足安能久人世哉？^①

一言以蔽之，防守港口是澄海海防的主要任务，这体现出修志者重视港口的军事地理价值。需要指出的是，雍正、乾隆以后，溪东港、东港、西港由于河道淤塞开始出现衰落趋势。^② 而“南港口淤塞，重船艰于出入，多泊大莱芜”^③。实际上，这些防守策略更多可能只是针对雍正朝以前的海防情形。

海岛是海防纵深延伸的基础，就澄海海防而言，大、小莱芜岛和南澳岛的战略价值尤为重要。但康熙、雍正二志《山川》篇对大莱芜山的记述，只强调其方位、道里和聚落情形^④，并未突出其海防功能。乾隆志《海防志》则载：“大莱芜，海底有沙汕一道，沉水礁三，一在汕下，一在澳内，一对留子门。东控南澳，贼艘必经之地，为海防最要。”^⑤ 以此表明澄海海防重心在于澄海外围的海域和海岛。

清代方志对于南澳岛海防价值的认识不断深化。康熙志《山川》篇在“南澳山”条下详细记述该岛的方位、名称、形状以及文人墨迹；简要提及该地军事、行政建置与久为盗寇渊薮的历史。^⑥ 其叙述角度多是基于地理、历史的描述，并未阐发山川形便对军事行动的影响。

而乾隆志《海防志》则载：“海寇出入，皆经表头、莱芜，而南澳其巢穴也”^⑦，直接阐明海盗出入路线及其巢穴地望。可见，虽然康熙年间澄海地方士绅已经认识到防守南澳之重要性，但将其作为海防经验总结进《海防志》则是在乾隆时期。无独有偶，雍正年间，曾任潮阳知县的蓝鼎元亦颇为重视南澳岛的军事地理价值，其在《潮州海防图说》中指出：

青澳在东，涛流险恶，无泊舟善地；云澳在南，近岸皆沙，水浅风飞，巨舰亦难停顿。是以左营舟师必分深澳驻泊，以深澳镇城所在，元戎放节之区也。深澳面北，半倚山阿，外险内宽，千舟可聚。若北风狂发，则不如隆澳之安。隆澳在西南，南台骤起，则又宜于深澳。^⑧

蓝鼎元早年曾追随族兄蓝廷珍出师入台，因此深谙岛屿、海澳在海防中的作用。蓝氏所言，侧重分析南澳岛4个重要港澳之湾泊条件、避风能力以及驻军情形，颇具创见。

乾隆志《海防志》在卷末再次强调防守莱芜岛的意义，并提出澄海之海防策略：

盖尝论之：守金陵者不守淮泗，则长江失陷；守雷廉者不守琼崖，则门庭受寇。澄城者，莱芜之金陵、雷廉也。断瓜州则山东之师不下，踞北固则两浙之路不通。莱芜者，澄城

^① 金廷烈纂修：乾隆《澄海县志》卷20《经略·海防》，“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潮州府部，第29册，第973页。

^② 参见王元林、刘强：《明清时期潮州外贸港口变迁》，《暨南史学》（第3辑），暨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

^③ 周硕勋纂修：乾隆《潮州府志》卷34《关隘》，“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潮州府部，第4册，第831页。

^④ 参见王岱纂修：康熙《澄海县志》卷1《山川》，王岱纂修：第33页；宁时文纂修：雍正《澄海县志》卷1《山川》，“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潮州府部，第27册，第40页。

^⑤ 金廷烈纂修：乾隆《澄海县志》卷20《经略·海防》，“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潮州府部，第29册，第960页。

^⑥ 参见王岱纂修：康熙《澄海县志》卷1《山川》，王岱纂修：第33页。

^⑦ 金廷烈纂修：乾隆《澄海县志》卷20《经略·海防》，“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潮州府部，第29册，第966页。

^⑧ 蓝鼎元：《鹿州初集》卷12《潮州海防图说》，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65页。

之瓜州、北固也。然则扼要争奇，审形制变，严接济之令，断樵汲之途。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寇果能越此而飞渡耶？若夫敦教，养勤抚绥，俾德化覃敷，游魂永靖，斯尤策之上者也，区区防海云乎哉！^①

地方士绅认为严禁接济、截断后勤供给是对付海寇的主要策略。清代前期，这种思想很有代表性，亦非常盛行。^②只是，修志者认为海防并非难事。这一认识与康熙志《海氛志》一脉相承，反映出以儒家学说为信仰的地方士绅，在对待海防问题时，依旧信奉教化的力量。

乾隆志《海防志》反映出方志《海防志》对于海防地理记述的重要转向，而这种转向受到省志、府志的影响。明代中后期的《广东通志》已经出现了海防的记述。嘉靖《广东通志》、万历《广东通志》在《海寇》篇中已经记述不少地理信息。表现在尤为强调海寇的出入路线、各港口间的水路历程以及海澳的地理环境^③，并开始关注日本的地理位置与风土人情。^④稍后成书的《粤大记·海防志》在沿袭旧志海防地理记述的基础上，增补《广东沿海图》，图中标注有卫所巡司、沿海聚落、海盗巢穴、港口海澳等信息^⑤，具有浓厚的地理色彩。雍正《广东通志》“复缀辑《筹海图编》《地图综要》《纪效新书》《粤大记》，各府县志诸书”^⑥纂成《海防志》，并附《海防图》。道光《广东通志》的海防记述则基本沿袭自雍正《广东通志》。^⑦要之，明清《广东通志》海防记述尤为注重地理要素。

海防地理成为乾隆志《海防志》的记述重心，还受到府志的影响。乾隆志提到：“统志本于省府志，府志本于县，而往往有彼此互异者……兹编，除本邑旧志外，若新、旧府志，邻近邑志，前辈名人文集及有关于邑事者，并从征引，以备参稽。”^⑧可见，府志与县志的修纂有密切的关系。乾隆《潮州府志》的成书时间比县志早一年，即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付梓，对县志编撰有直接影响。如乾隆志《海防志》关于考证的注释有10余处，其中有4处标记来源于“府志”。进一步检核《海防志》中的海防冲要，与现存的《潮州府志》相比较，可以发现嘉靖、顺治、康熙三版府志都没有相关记载。这些重要的海防地理信息是首次被乾隆《潮州府志》整理在册（参见表1）。

^① 金廷烈纂修：乾隆《澄海县志》卷20《经略·海防》，“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潮州府部，第29册，第972—974页。

^② 参见王宏斌：《清代前期关于福建台湾海防地理形势的认识》，《史学月刊》2001年第2期。

^③ 参见黄佐纂修：嘉靖《广东通志》卷66《外志三·海寇》，“广东历代方志集成”省部，岭南美术出版社，2006年影印本，第4册，第1724—1725页；郭棐纂修：万历《广东通志》卷70《外志五·倭夷海寇附》，“广东历代方志集成”省部，岭南美术出版社，2006年影印本，第7册，第1606页。

^④ 参见黄佐纂修：嘉靖《广东通志》卷66《外志三·海寇》，“广东历代方志集成”省部，第4册，第1725页；郭棐纂修：万历《广东通志》卷70《外志五·倭夷海寇附》，“广东历代方志集成”省部，第七册，第1606—1607页。

^⑤ 参见郭棐撰，黄国声、邓贵忠校点：万历《粤大记》卷33《政事类·海防》，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944页。

^⑥ 郝玉麟纂修：雍正《广东通志》卷9《海防志》，“广东历代方志集成”省部，第11册，第255页。

^⑦ 参见阮元纂修：道光《广东通志》卷123《海防略一》，“广东历代方志集成”省部，第17册，第2118—2137页；阮元纂修：道光《广东通志》卷124《海防略二》，“广东历代方志集成”省部，第18册，第2138—2166页。

^⑧ 金廷烈纂修：乾隆《澄海县志》卷首《凡例》，“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潮州府部，第28册，第96页。

表1 乾隆《潮州府志·关隘》所见澄海县海防冲要表^①

序号	冲要	等级	是否为乾隆志《海防志》沿用
1	樟林港	海防最要	是
2	东陇港	海防最要	是
3	南洋	海防次要	是
4	南港	海防最要	是
5	莱芜	海防最要	是
6	新港	海防次要	是
7	鸥汀城	海防次要	是
8	东港	海防最要	是
9	大澳	海防最要	否
10	沙汕头	海防最要	否
11	双溪口	海防最要	否
12	庵埠	海防最要	否
13	溪东港	海防最要	是
14	蓬洲所城	海防次要	是

乾隆府志认为“潮之最要者，莫如海防”^②，故修志者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将水、旱关隘“分别最要、次要，俾成算在胸，缓急可恃”^③。如上表所示，澄海境内的14处海防要塞，府志均有等级标注，其中有10处都被县志《海防志》沿用。未被县志沿用的大澳、沙汕头、双溪口、庵埠4处要隘，是因为前3处地方与乾隆志《海防志》所载之海防事件无涉，而庵埠在当时则属于海阳县地方，府志将其列入澄海县与事实不符，故《海防志》亦未在篇中说明该处的海防地理价值。

清代前期学者、军事家对沿海地理军事价值的认识颇丰，王宏斌总结为6个方面，分别是：第一，分析海区地理形势。第二，论述海岸地理特点、岛屿位置的战略战术价值。第三，研究海洋水文、气候要素。第四，分析海口、海港、海道等问题。第五，提出建设军事要塞的建议。第六，论证海防战争主、客形势的变化条件。^④王氏所论的海防地理思想主要总结自当时著名学者和朝廷大员。将之与乾隆志《海防志》等比较，可以发现，乾隆志《海防志》对澄海军事地理价值的认识，除未分析海防战争主、客形势的变化条件，以及较少分析海防自然因素对海洋作战的影响作用外，其他记述的内容与军事家、著名学者的海防地理思想不谋而合。

乾隆志《海防志》的书写范式和记述宗旨为嘉庆志《海防志》所沿袭，只是后者有两点创新。一方面，嘉庆志《海防志》的记述内容与海防形势结合较为紧密。嘉庆年间，海防局势已有所变化，嘉庆志《海防志》云：“近年萑苻告警，日久蔓延，至剿抚兼施，乃能扑灭。然则安

^① 参见周硕勋纂修：乾隆《潮州府志》卷34《关隘》，“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潮州府部，第4册，第831—832页。

^② 周硕勋纂修：乾隆《潮州府志》卷34《关隘》，“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潮州府部，第4册，第826页。

^③ 周硕勋纂修：乾隆《潮州府志》卷首《凡例》，“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潮州府部，第4册，第28页。

^④ 参见王宏斌：《清代前期海防：思想与制度》，第179页。

靖海疆者，可勿防之于未然也哉。志海防。”^①又，“自林爽文滋扰台湾之后，始有海寇”，由于官府控驭不足，于是海寇“势益蔓延”^②。这些记述都反映出乾嘉之际的海防危机再现的新动态。因此，嘉庆志《海防志》的记述不仅注重总结历史经验还着眼于现实的海防局势。

另一方面，嘉庆志的纂修者已意识到现行海防制度，如营汛和哨船之于海防的意义。乾隆志的通例和卷目设计均未阐明营汛与海防的关系。^③而嘉庆志《凡例》则称澄海为“潮之门户，三面滨海，港汊最为丛杂，故防山易而防海更难，兹志中于海防之后，继以营汛，宁详毋略，亦安不忘危之义也”^④。嘉庆志《营汛志》所载之营制、哨巡、兵船等事宜均与海防密切相关。因此，该志在《海防志》之后附载《营汛志》以从其类，并指出“立营汛，备哨船，此防海之要务也”^⑤。这是澄海地方士绅基于海防实战经验的总结。

结语

综上所述，在通志和府志的影响下，清代澄海县志《海防志》的体例和记述内容存在明显变化：康熙、雍正两版县志取纪传体，以海寇为中心记述海患事件；乾隆、嘉庆版县志则改为编年体，记述内容以海防建置和海防地理为重。

清代澄海县志《海氛志》与《海防志》的成书，需要放在明清粤东海防制度变迁的历史脉络之下进行审视。明代粤东海防的防御体系经历了从巡海备倭到水寨兵船的转变过程。万历三年（1575），朝廷在南澳岛设立漳潮副总兵，在粤东海防体制建设上具有标志性的意义。明清鼎革之际，明郑集团在粤东地区进行长达十余年的军事活动，对当地海防建设和方志记述有重大影响。康熙志《海氛志》改编府志《兵事志》的内容，正是地方士绅在面对强大的海寇集团的威胁之下，为掌握历代海寇活动规律而形成的经验总结。

康熙、雍正年间，随着沿海炮台、墩台的建设以及巡洋制度的实行，海疆防御能力得到提升，于是独立的《海防志》开始大量出现，并呈现出新的面貌。地方士绅认识到海寇已然成为历史，遂基于海防实践和实地考察的认识，将海防记述的内容逐渐转向海防制度和海防地理层面，于是方志修纂者选取《兵防志》《山川志》及《地理志》的信息编入《海防志》，乾隆志《海防志》的成书就是这种认知的反映。因此，乾隆志《海防志》更换篇名为“海防”，其书写范式和新增内容也彰显着“海之有防”的效果。虽然海寇已不是重点关注的对象，但出于总结历史经验的需要，康熙志《海氛志》中教化海寇的思想依旧为乾隆志、嘉庆志《海防志》所保存。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历史学系暨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本文责编：周全宿万涛

^① 李书吉纂修：嘉庆《澄海县志》卷22《海防》，“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潮州府部，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影印本，第27册，第558页。

^② 李书吉纂修：嘉庆《澄海县志》卷22《海防》，“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潮州府部，第27册，第558页。

^③ 参见金廷烈纂修：乾隆《澄海县志》卷首《目录》，“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潮州府部，第28册，第29—31页。

^④ 李书吉纂修：嘉庆《澄海县志》卷首《凡例》，“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潮州府部，第27册，第306页。

^⑤ 李书吉纂修：嘉庆《澄海县志》卷22《营汛》，“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潮州府部，第27册，第558页。